

文 |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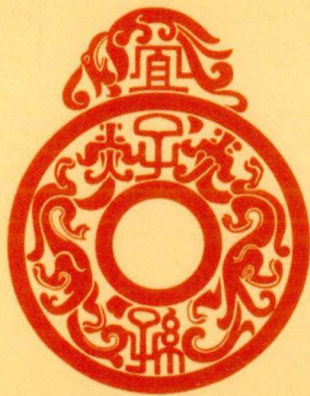


# 十一家注孙子

〔春秋〕孙 武 撰

〔三国〕曹 操 等注

杨 丙 安 校理



中 华 书 局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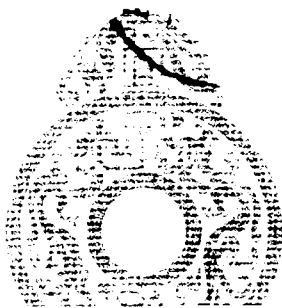


# 十一家注孙子

〔春秋〕孙 武 撰

〔三国〕曹 操 等注

杨 丙 安 校理



中 华 书 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一家注孙子/(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2.3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08118-3

I. 十… II. ①孙…②曹…③杨… III. ①兵法 - 中国 - 春秋时代②孙子兵法 - 注释 IV. 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3930 号

- 
- 书 名 十一家注孙子  
撰 者 [春秋]孙 武  
注 者 [三国]曹 操等  
校 理 者 杨丙安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原版责编 高流水 薛有红  
新版责编 石 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½ 插页 2 字数 310 千字
-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118-3  
定 价 27.00 元
-

##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余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12月

##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及其流变(代序)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是孙子兵法除武经七书之外的另一重要传本系统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的母本,自从中华书局于一九六一年影覆以来,学界曾予以极大重视,并围绕着它进行了不少整理研究工作。陈彭同志和我在一些文章中也曾谈到过它,在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也曾做过专题发言(-),不过都谈得比较简略,有些问题还没有谈到,所以想在这里比较集中地谈一谈,以供研究参考。

### 一、宋本十一家注与宋志所录吉辑 十家会注的关系及其刊刻时间

一说到宋本十一家注,我们马上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它是否就是宋史艺文志所录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吉辑未著十家姓名,而宋本又未著辑者姓名。这就自然容易使人把它们二者合而为

一。问题是，宋本注家并非十人，而是十一人，即曹操、孟氏、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王皙、梅尧臣、何氏和张预。既为十一家，但郑友贤在其遗说并序中却为何一再说是“十家之注”，并称其遗说为“十注遗说”呢〔二〕？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举成数言之；二是如孙星衍、毕以珣和余嘉锡先生所说：杜佑本不注孙子，其注乃通典之文。去佑不数，正合十家〔三〕。孙星衍之所以直称其道藏原本即宋志吉辑，除上述外，可能还有一条原因，就是道藏孙子是十三卷，而吉辑也是十三卷（宋志作“十五”，或系“十三”之误，或是十三篇每篇为一卷，外有附录二卷）。如果孙氏的判断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宋本即吉辑。王晋卿文禄堂访书记也直称其所见宋本即吉辑。余嘉锡先生也毫不怀疑原漕内府所藏宋本“实即吉天保十家会注”。若确如孙、余所说，那么，天禄琳琅书目所说“本有十家注，友贤辑且补之为十一家”之说就是牵附之辞了。不过，这里余嘉锡先生也有一个小小的误会，就是天禄书目本来是说原有十家，“友贤辑且补之为十一家”，而余先生却认为是“并友贤为十一家”了。

二者若实为一书，为甚么卷数不侔呢？可能是同书而异刻，或者说宋本是吉辑的另一刊本。例如曹注，新、旧唐志所录即迥然有异，一为三卷，一为十三卷，而且书名也不尽同。所以原刻为十三卷，而重刻时却将十三卷（篇）又分为上、中、下三卷，这是完全可能的。再者，郑氏遗说中说得明白，“十家之说出”，他感到“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于是乃撰十注遗说。这自然是说十注之出在先，而其遗说之作在后。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此附有郑氏遗说的宋本十一家注，并非十注原刻而是其重刻呢？或者说是它的另一刊本呢？这似乎也是可以的。

那么,此书是否为郑氏所刻呢?我过去也曾怀疑过这一点。但仔细考虑,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若为郑氏所刻,则不致出现遗说称“十注”而书名又称“十一家注”的情况。故可以认为是:刻者据十注重刻时收入了郑氏遗说,并以注家实为十一家而题为书名。不过这种理解毕竟还带有某些揣测性质,所以作为一种说法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它就是无可置疑的科学结论,因为除足以说明二者关系的资料尚欠充分,致使我们对有些事情很难说清之外,还有一个“第三者”给我们添了麻烦,这就是日本昌平坂学问所也存有一部名叫十家注孙子的书<sup>〔四〕</sup>。此书未著辑者姓名,但却著有十家姓名,即曹操、王凌、张子尚、贾诩、李筌、杜牧、陈晔、孙鑄、梅尧臣和王皙。显然,由于这十家与宋本所著“十家”出入很大,故可肯定二者不是一书。但它是否就是吉辑呢?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在历史上,佚之于此而得之于彼者的事例是不不少的。我们只能根据某些迹象作如下推测:昌平坂本十家注中的王凌、张子尚、贾诩与孙鑄四家,唯贾本见于日本国现存书目,其他三家在日本则未见有著录,故可推断该本非日人所辑。而在中国,除吉辑与现存十一家注外,也不见有另一十家注被著录。故谓该本即流传日本的吉辑,亦并非无稽之谈。不过,关于该本的情况,由于我们知道得很少,所以不能作较多的论述。我们只能说无论它是否吉辑,它与宋本都不是一书。

关于宋本与吉辑及其与昌平坂十家注的关系,我们只能说这么多。下面再谈它的刊刻时间。

关于该书的刊刻时间,中华书局影印本后记说:“从书中避讳至‘廓’字推断,当为南宋宁宗时所刻。”李零同志也是这种看



法〔五〕。我在前述文章中也曾这么认为。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出版说明则说“刻于南宋年间”，这种说法虽然不错，但终嫌笼统。至于说刻于南宋什么时候，是否宁宗时代，这里似乎还有些问题值得推敲。

（一）这种看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主要是“书中避讳至‘廓’字”，因宁宗名扩，而“扩”与“廓”音同义近，均读阔夔切，故依宋讳例，避“扩”则必兼“廓”而避之。陈垣先生史讳举例据绍定礼部韵略亦谓“廓”在避讳之列，也就是说避“扩”必避“廓”，而避“廓”即避“扩”。反言之，若不避“廓”，亦即不避“扩”。而查该书军争篇却有“廓地分利”，作“廓”。杜牧、贾林、王皙、梅尧臣与张预等家注文亦皆著“廓”字，武经孙子亦作“廓”，是原本本作“廓”，而该本仍作“廓”。由此可知，作“廓”并非由于避“扩”，而是沿袭旧文。既不避“廓”，即不避“扩”。既不避“扩”，则可推断其刊刻时间必非宁宗之世，而应在宁宗之前。

（二）再就其著录情况观之。该书最早见录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尤氏乃孝宗淳熙名臣，且大体与之同庚，死于光宗绍熙末年（公元一一九四年），亦即死于宁宗即位（公元一一九五年）之前。尤书目成书时间虽不可确知，但“遂初”之名乃光宗所赐，故其书成于宁宗之前，迨无疑问。该书既见录于尤书目，则必刊于尤书目成书之前，亦即宁宗即位之前，而非宁宗时代。

据上可知，宋本刊于宁宗时代的推断似乎是难以成立的。至于在宁宗以前的甚么时候，这也可由其讳字得知。查九地篇“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句，何注“二贼交構”之“構”字作“構”。作战篇“十万之师举”，曹注“購赏犹在外”之“購”字也作“購”，均避高宗讳。故该书必刻于高宗之世或之后，而不会

在他之前。那么后到何时呢？我们知道，高宗之后至宁宗之前，这中间只有孝宗和光宗。孝宗名昚，“昚”即古“慎”字。查计篇“天者”句杜牧注有“梓慎”，火攻篇又有“明君慎之”，此“慎”字该书皆缺笔作“慎”，注中“慎”字亦皆如此，显系讳字。这说明它不避宁宗讳，而避高宗讳和孝宗讳，亦即避讳至“慎”字，而非“廓”字，所以该书的刊刻时间当是孝宗时代，而非宁宗时代。

至于刊于孝宗甚么时候，王晋卿文禄堂访书记称其刊于乾道年间。此论断虽未著所据，但书中所著刻工勉若即南宋初杭州著名刻工孙勉的话，那么，这个论断也是具有可信性的。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又录有一部宋绍兴间礼部刊十一家注孙子，并称此即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惜未见。如此，则该书或初刻于高宗绍兴，此刻于孝宗乾道欤？

## 二、三种宋本的传世及其版本流变

该书自见录于尤书目之后，直到清初，均不见官私书目著录。清初以后，虽有私家书目著录，但也只在极少数藏书家那里流传，广大社会仍默默无闻。直到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予以影覆之后，其真实面目才大白于天下。那么，它传世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今传世宋本所见仅三，兹分述如下：

(一)上海图书馆藏本。此书四库虽不见录，但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季沧苇藏书目、延令宋版目录、传是楼宋元书目与天禄琳琅书目均有著录，是该书原为清初钱曾旧藏，后归泰

兴季振宜,又归昆山徐乾学,再归清内府。书中亦钤有“袁垞”、“沧苇”、“昆山徐氏家藏”与“天禄继鉴”等印记。述古堂宋版书目又有同名之书一部,唯作二卷。传是楼书目亦另有一宋本,因无其他材料可资证明,故难辨其异同。该书于抗战时期曾随溥仪流落长春,抗战胜利后,北京隆福寺育民书店 雒云培先生去东北购得此书,售与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七年该馆善本书目所录即此书。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据以影覆。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予以重印,并排印。台湾华联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亦予以翻印。

(二)北京图书馆藏周叔弢先生赠足本,文禄堂访书记曾予著录。其中有明版补页,书尾有承德堂牌记,并有“高山流水”、“戎马书生”与岳飞伪印。中华据上图本影覆时,曾据以摄补。

(三)北图除上述周赠足本外,另藏有一残本,仅存卷下地形以下四篇,钤有“项子京家珍藏”、“稽瑞楼”与“常熟翁同龢藏本”等印记,是该本曾经项子京、陈子准与翁同龢收藏,并由翁捐赠,稽瑞楼书目曾著录该本。

宋本传世情况略如上述,下面再谈一谈它的版本流变情况。

要说宋本的流变,得先说道藏,因为它是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承上启下的重要传本。

该书未见元刻,至明,则有道藏本。我们知道,道教自唐、宋以来分为两派,因此作为道教经典的道藏,据顾修汇刻书目的说法,也有南北两本。而无论南北,均源于宋徽宗的政和道藏,即所谓万寿藏。元世祖因信奉佛教,曾于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下令焚毁道教经典,故道藏因遭火劫而残缺不全。

明初,由金陵道院重辑,并于正统间印就,分颁天下道观。孙子在“太清部”,题曰“孙子注解”,十三卷,每卷一册,前八卷在“性”字号,后五卷及郑氏遗说在“静”字号,经折装,十行十六字。民国初年,徐世昌据北京白云观赐本影摹,并缩为石印六开小本,把梵页两页合为一页,也就是把经折装改成了通行的线装,由上海涵芬楼重印。我们通常见的道藏就是这个本子。孙星衍据以校正孙子的道藏是华阴道藏,属于北藏。顾修说它是“宋人旧藏”,但实际上是经后人重修的,而且它的颁赐时间比南藏还晚,是在万历中。此道藏已不可见,但从孙氏校语可以看出,它与正统道藏并非同书,二者大同而小异。例如九地篇“争地则无攻”句注文,正统道藏残缺五六处,而孙氏所据华阴道藏则与之有别,如与宋本对照,正统道藏一处为“梅尧臣曰:形胜之地,先据乎利;敌若已得其处,则不可攻”,而华阴道藏则为“王皙曰:敌居形胜之地,先据乎利,而我不得其处,则不可攻”。另一处是“张预曰:不当攻而争之,当后发先至也”,而华阴道藏则为“我欲往而争之,而敌已先至也”。其他又如:书名不同,一曰“孙子注解”,一曰“孙子集注”;计篇“令民与上同意”句孙校云“‘令民’二字原本脱”,但正统道藏却不脱;该篇“法者”句曹注“主军费用”句孙校云“原本作‘主君’,误”,但正统道藏却仍作“主军”,不误;九地篇“上下不相扶”句孙校云“原本作‘救’”,但正统道藏却作“收”,等等。这不可能都是刊刻上的问题。由此可见,华阴道藏虽非政和道藏旧帙,但亦与正统道藏有别。从其上述文字与嘉靖谈本(见下)全同且书名亦同来看,这两种刊本关系倒更密切,或者是补修时参据过该本,亦未可知。

南北道藏之间尚存有歧异，它们与宋本之间就更不用说了。书名不同，是其一；篇卷有异，是其二；其三，宋本后无曹序，而正统道藏却有。不过，这些差异都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十三篇正文乃至孙校序所说“书中或称曹公为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后，或不知何延锡之名，称为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其孙杜牧之后”等错乱现象皆一如宋本，上述正统道藏文字也与宋本全同，而这也是其所从出之确证。再者，毕氏叙录说：“孙子道藏（按：指华阴道藏）原本题曰集注，大兴朱氏本题曰注解。”是朱氏本乃自正统道藏出，惜已不可见，而集注本则流传了下来，其刊本主要有二：

（一）世宗嘉靖乙卯（三十四年，公元一五五五年）锡山谈恺刊本。谈恺，嘉靖进士，字守敬，锡山（今江苏省无锡市）人，累官至副都御史，以功拜兵部侍郎。该书之刊，乃在其督军虔台之时。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直称其书“即宋志所称十家注也”，并说：“陌宋楼藏书志有明刊十卷本，序失名氏，刻于万历乙丑。此书为十三卷，序则嘉靖乙卯锡山谈恺督军虔台，进武弁及生儒问之，无有知是书者，故授之梓，则刻于万历之前矣。”该书上述错乱现象与道藏无异，且于行军篇“必依水草而背众树”与“此处斥泽之军也”之间复插入三十多句，而此三十多句之次序亦颠倒，错乱不堪，书后亦无郑氏遗说。该本原系丁氏家藏，后归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又影印入四部丛刊，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北大图书馆藏有明本残卷。

（二）神宗万历乙丑（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黄邦彦刻本。卷首有程涓序，卷末有黄氏后序。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云：“阳湖孙氏校刊本称道藏原本题曰集注，大兴朱氏刻本题曰注

解,今此题集注,则知亦源于道藏。”又云:“明人重刻有朱氏所藏注解本,又有此本,而四库皆不著录,则流传之少可知也。”该本于文字虽有个别校订,为校孙子所不废,但于行军篇之错乱则一无是正,而道藏则无,且题名亦同,故当自谈本出,唯改注文为双行小字夹注,体制较胜耳。北图及北大均藏有此书。

该书在明代的情况,除上述外,尚有二事值得一提:一是清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录有一部明穆宗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李韡斋十一家注孙子刊本,书名与尤书目所录相同,当是据宋本影覆。现存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周叔弢先生赠本上有明版补页,此补页或即取自李本,因该书明本未见有二。二是明曹允儒的孙子握机纬,十三卷,乃十一家注的选本。四库提要录之,并称曹字鲁川,江苏太仓人,与戚继光相友善。如此,则此书之作,当在隆庆、万历间,至迟也不过熹宗天启年间。

该书到清代,首先引起重视的是郑达。据安徽通志馆艺文考稿称,郑达乃顺、康间合肥人,字士行。他在其孙子附解序中说:“尝闻孙子有十家注,在河洛之交……久而得之淮阴道藏中,因录持归。又数年,有附解之作。”可知此书也源于道藏。唯其书不传,影响也不大。而成就最大、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的,要数孙星衍孙子十家注了。孙星衍,是乾、嘉间的著名经学大师,他在其兵法序中说:“曩,予游关中,读华阴岳庙道藏,见有此书。……又从大兴朱氏处见明人刻本。……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文是正其文。适吴念湖太守、毕恬溪孝廉皆为此学,所得或过于予,遂刊一编,以课武士。”他以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主要依据通典、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

作了订正,对十三篇经文也作了许多校改,并据宋志直题孙子十家注。由于他的努力,这一传本系统,经过数百年的沉寂,终于取代了武经而跃居主导地位。此后,直到宋本十一家注影覆问世,整理研究孙子者,大都以他的校本为依据。孙校本刊本很多,共约二十余种,由于大都能见到,所以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刊本虽很通行,但文字却有些问题。嘉庆二年观察署本虽刊刻较早,但校对似欠精善,除留有墨台多处外,还有大段漏刻注文的现象。军争篇“此治气者也”句,竟漏刻李筌、杜牧、陈皞、杜佑、梅尧臣和何氏等家全部注文与张预的部分注文共四百七十餘字。光绪三年浙江书局刊刻二十二子,用的就是这个刻本。而浙江书局本却说是“据孙氏平津馆本重校刻”,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不仅这两种刻本漏误相同,而且平津馆丛书内只收录有曹注本,十家注本是收录在岱南阁丛书内。岱南阁丛书所收观察署本是据嘉庆三年(公元一七九八年)本重刻,该本虽也存有若干墨台,但却没有上述情况。以后凡据该书重刻重印的,如丛书集成初编,自然也就无上述现象。但据浙江书局本重刻重印的,如四部备要与诸子集成等,则都有缺漏。而备要本讹误尤多。这一方面说明,孙校本的流传也有着不同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说明,该书传本也并不都是善本。相比而言,岱南阁及其传本较善,其中光绪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杨霖萱校本刊印尤精。

关于宋本在明、清两代的流变情况略如上述,这里再提一提以它为代表的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各本在国外的流传情况。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日本,有宽永六年(公元一六二九年)官刊本,宽文九年(公元一六六九年)村上勘兵卫本,天保十

三年(公元一八四二年)官刊本,嘉永六年(公元一八五三年)活字重印本,大正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富山房汉文大系排印本与昌平丛书本等。在朝鲜,有明永乐七年(公元一四〇九年)活字本与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枫山官库本〔六〕。

### 三、曹注单本与其他各单注本的命运

由于该书是辑注本,既集中了众家之长,又为学者提供了方便,所以它一问世,各单注本就好像完成了任务而退居幕后,而且大都先后销声匿迹,唯有曹注本尚留传至今。

如所周知,曹操不但“料敌制胜,变化如神”,而且又“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他于戎马倥偬之际为孙子作注,使孙子兵法进入了注释的新时代。他的注虽不能说尽美尽善,但却简要质切,多得孙子本旨,而且又据其御军三十年之经验,对十三篇原意多有发挥〔七〕,故为后世所推重。而这也正是其注能得以长期流传的原因所在。其注,阮孝绪七录录之〔八〕,唯作二卷,旧唐志作十三卷,新唐志又复三卷之旧,并题曰“魏武帝注孙子”,宋志同。而晁氏读书志则作一卷。与他家合刻而以辑注形式出现者共有五种,即曹、王(凌)集解,曹、萧(吉)注,曹、杜(牧)注,曹、杜、陈(皞)、贾(林)、孟氏五家注与吉辑十家会注〔九〕。显然,十家注或十一家注就是在曹注、曹杜注与五家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武经所收孙子亦为曹注,而且只有孙子有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元丰六年,国子司业朱服承诏校定武经,孙子止用魏武帝注,馀不用注。”〔一〇〕此带注的武经孙子当即宋以后曹注单本的重要版本来源。不过,孙诒让说它是“唐



以后删定之本，注文简略不全”〔一一〕。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孙吴司马法所收宋本曹注当即从武经中抽出而与吴子、司马法合刻者。此本乃顾之逵小读书堆旧藏，并由其弟顾广圻影摹刊行。关于这一点，孙序说得明白：“孙子三卷，魏武帝注……宋雕板，嘉庆五年属顾茂才广圻影写刻板于世。”顾氏藏本现已不知去向。据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续录称，他曾见过此书，并说书中避讳至“慎”字。如此，则系孝宗时所刊，与十一家注大体同时。

曹注明本，北图除藏有武经二十五卷本与孙子、吴子五卷合刻本外，还有清徐乃昌校明刊丛书零种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一部嘉靖四十年（公元一五六一年）陈旸校刊本，惜未见。另，严灵峰知见书目又录有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至清，所见亦有十余种，主要如：四库孙吴司马法抄本，孙星衍嘉庆五年（公元一八〇〇年）平津馆丛书本，张皋文校博物志本，张惠言校汉魏丛书本，王念孙校（王懿荣跋）抄本，庄肇麟过客轩刊印本，同治半亩园兵法汇编本，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淮南书局重刊孙氏平津本，光绪甲申（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朱记荣重刊平津本，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成都志古堂本，光绪间成都运筹山房写刻左枢笺注本，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等〔一二〕。曹注本在日本，有天正八年（公元一五三〇年）抄容安书院藏本，庆长五年（公元一六〇〇年）活字本，宝历甲申（公元一七六四年）冈白驹校刊本，天保四年（公元一八三三年）官刊平津本，明治十六年（公元一八八三年）据宋刊铜板本，以及昭和四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东京文求堂影印平津本等〔一三〕。

关于曹注本的情况，略如上述。以下再分别谈一谈其他各